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陈平原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所有曾游历过或居住在北京的人们, 都有关于这座城市不同程度的记忆;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将这种自然生成的零散漂浮的印象, 变成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将“记忆”从名词转化为动词, 意味着一个人物、一件史事或一座城市有可能从此获得新生。本文集中探讨如何将被动的“北京记忆”转化为主动的“记忆北京”, 并指出“北京学”研究虽然在目前远不及“上海学”辉煌, 但相信这个领域将更有发展潜力。

【关键词】 北京; 文学想象; 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 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05) 01-0003-09

—

作为名词的记忆, 乃是保留在脑海里的关于过去事物的印象; 作为动词的记忆, 则是追想、怀念、记住某人与某事。当你说“昔游再到, 记忆宛然”(《关尹子·五鉴》)时, 指的是前者; 当你说“醒来记忆, 谱入管弦”时(《长生殿·闻乐》), 指的则是后者。所有曾游历过或居住在北京的人们, 都有关于这座城市的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记忆;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将这种自然生成的零散漂浮的印象, 变成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将“记忆”从名词转为动词, 意味着一个人物、一件史事或一座城市有可能从此获得新生。

不妨借用鲁迅的两篇文章, 阐发“记忆”之如何成为重要的文化生产与创作动力。在《忆韦素园君》中, 鲁迅用文学化的语言, 谈论其对于往事以及故人的记忆:

【收稿日期】 2005-01-06

【作者简介】 陈平原(1954-), 男, 广东潮汕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

我也还有记忆的, 但是, 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 有些还留在身体上, 有些是掉在水里了, 将水一搅, 有几片还会翻腾, 闪烁, 然而中间混着血丝, 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1](P63)}

除了对“赏鉴家”的讥讽别有幽怀外, “零落得很”的记忆, 乃是人间常态。至于“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 如此比喻, 妙不可言。

所有对于往事的记忆, 必定都是残缺不全, 有因时间侵蚀而断裂, 也有因人为破坏而损耗。面对往日生活的破碎印象, 必须有足够的想象力与理解力, 方才能很好地复原那些远去了的历史场景, 并对其作出准确的价值评判。残片很美, 也颇能打动我们; 可更美妙的, 还是如何将残片连缀成文。文学家和学问家的努力, 就是搜寻失落的中间环节, 填补诸多空白, 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已经消逝了的世界, 并发掘其深藏的意义。

像《朝花夕拾》那样的散文，不用说，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2](P230)}可就连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对往日生活的追忆。这一点，《〈呐喊〉自序》说得很清楚：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3](P415)}

其实，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诸多名篇，都是建立在对于往事的精彩记忆，以及对于记忆的深度阐发上。在这过程中，由于回忆者的文化立场以及审美趣味，可能会污染证据，也可能会误入歧途，更可能过度诠释；但无论如何，人类无法抵御回忆往事的巨大诱惑。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欧文（即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论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时，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说，在西方传统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和真实上，那么，在中国传统中，与它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4](P2)}

西方我不敢说，但要说古代中国人对于再现往事的兴趣，以及对于追忆这一行为的敬重，那我信。人类无法进入“时间隧道”，去修补不尽如人意的历史；但回忆往事的诱惑，却实实在在地存在。

说国人常常沉湎于对往事的记忆，其实不太恰当。不错，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历史著述，也不乏召唤往事的诗文；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又很健忘——尤其是对于那些惨痛的往事。

作为动词的“记忆”，构成了人类重要的生活方式，其直接对应物，则是有意无意的“忘却”。在鲁迅笔下，“记忆”与“忘

却”之间的巨大张力，几乎构成了一部现代史。对中国人之“记性不佳”，擅长忘却，鲁迅很是痛心疾首：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5](P162)}

国人常说“前车之鉴”，可实际上，对那些过于惨烈的往事，往往不堪回首。战死在黄花冈的烈士，先是被当作茶余酒后的谈资，接着，便被寻求欢乐的人们所忘却。因为，“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6](P409)}读读鲁迅那些饱蘸血泪撰写的文章，比如《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白莽作〈孩儿塔〉序》等，你能理解作者的悲愤之情。与“遗忘”抗争，不断回忆并努力发掘那些被统治者刻意抹煞的历史印记，在任何时代，都是悲壮的举动。

追忆往事，并不仅仅是为今日的决策提供某种借鉴；那样的思路，实在太狭隘，且乏味得很。你会为往事所感动，也能从中获得启示，但就像欧文所强调的：“古代的东西并不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它们是价值的具体体现”；“如果仅仅把过去应用于现在，我们就永远掌握不了完整的过去和有生命的过去”。^{[4](P17-19)}即使我们目不转睛，即便我们万分虔诚，依然无法完全摆脱以今人的眼光和趣味去剪裁历史，如果再添上“借古讽今”的创作意图，焉能不处处陷阱？其实，我们只能记忆我们愿意记忆的——外在的限制以及内心的恐惧，使得我们所谈论的文明史——包括北京城，永远只能残缺不全。

就拿北京城来说，经由一代代作家及学者不懈的努力，其形象正日渐清晰，其魅力也正日渐呈现。追忆往事，抗拒遗忘，尽可

能多地呈现丰富复杂的历史面相，这就是我所说的由自发的“北京记忆”，转向自觉的“记忆北京”。

二

20年前，作家萧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该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馆了”。为什么？理由很简单：

今天，年轻的市民连城墙也未必见过。他们可知道民国初年街上点的是什么路灯？居民怎么买井水？粪便如何处理？花市、猪羊市、骡马市，当年是个什么样子？东四、西单还有牌楼？

至于老北京的民俗，比如婚丧礼仪、还有雍和宫的“打鬼”，国子监的祭孔，以及一年到头举行的庙会，“真有说不尽的热闹”。萧乾认定：“这么一座以古老城市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为内容的博物馆，不但会吸引外国旅游者，更有助于本地市民的‘寻根’。”^{[7](P41)}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热潮中，北京人终于发现，我们需要找到自己跟这座城市之间的血肉联系。而这，无疑比吸引游客赚取外汇还要重要得多。

第二年，萧乾又在《北京晚报》上连续发表十则《北京城杂忆》，除了新旧北京的衣食住行、人情世态、历史掌故、京白与吆喝、布局和街名，还提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做寓公的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提维尔所撰《北京的声与色》、30年代在北大教书的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的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老舍的《龙须沟》、传统相声《卖布头》、《大改行》等。或许，在萧乾眼中，文学的文本跟城市的历史，二者互相交织，密不可分。而这，正是关注都市生活的文学史家所要讨论的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 Richard Lehan 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中，将

“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于是，既涉及物质城市的发展，更注重文学表现的变迁。

随着物质城市的发展，她被用文学措辞再描述的方式（特别是在小说方面）也得到了不断的演进：喜剧的以及罗曼蒂克的现实主义带我们穿越商业城市；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带我们进入工业城市；后现代主义则带我们洞察后工业城市。城市和文学文本共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像所描述的方式。^{[8](P289)}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像的混合物。

陈桥驿在推荐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称扬其超越了传统的“人文学性的历史记述”，而成为“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前者“从叙述城市的历史沿革，考证城市的地名由来，探究城市的人物掌故以至坊巷俚语、市井逸闻，面面俱到，无所不有”，因此不可能有“深入的分析”。我基本同意陈先生的看法，只是希望略作补充。我并不认为只有“通过城市的社会经济的研究”，才能揭示城市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9]文学想像与文化记忆，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城市。

谈到北京，我一再坚持，必须把“记忆”与“想像”带进来，这样，这座城市才有生气，才可能真正“活起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有斑驳的百姓家，只有来去匆匆的燕子，还不够，还必须把“旧时王谢”的历史记忆带进来，这个画面才完整，才有意义。把人的主观情感以

及想像力带人都市研究,这个时候,城市才有了喜怒哀乐,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另一方面,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10]记忆与实录之间,固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学创作与历史著述,其对于真实性的界定,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驰骋想象”,这个让历史学家深感头痛的话题,很可能在文化史家那里如鱼得水——解读诸多关于北京的“不实之辞”,在我看来,意味无穷。因为,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不管虚实真假,同样值得尊重。学者的任务,不是赞赏,也不是批判,而是理解与分析。

走出单纯的风物掌故、京味小说,将“北京城”带入严肃的学术领域,这很重要。但同是都市研究,主旨不同,完全可能发展出不同的论述策略。注重历史考证与影响现实决策,思路明显不同。倘若将城市作为文本来阅读、品味,则必须透过肌肤,深入其肌理与血脉,那个时候,最好兼及史学与文学、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

三

在我看来,阅读北京,最好兼及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漫游者的好奇心。这方面,德国的文化史及文艺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是个很好的例子。比如,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借助游手好闲者的眼光来观察巴黎:

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这是游手好闲者的凝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给大城市人们与日俱增的贫穷洒上一抹抚慰的光彩。^{[11](P189)}

学者本雅明一如诗人波德莱尔,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这种兼具体贴、温情与想像力的“漫游”,既不同于市民的执著,也不同于游客的超然,而是若即若离,不远不近,保留足够的驰骋想象的空间,还有独立思考以及批判的权力。

“游手好闲者”之观察城市,注重瞬间、偶然以及破碎的现代体验,其关于都市场景的描述以及社会现象的观察,不以完整性诱人,而以深刻性见长。一方面,这是本雅明特有的写作方式——为各种新颖的城市意象所吸引,注重个人体验,喜欢寓言与象征,使用诗一样的语言,因此言不尽意,引诱阅读者参与对话;另一方面,理解城市,我们确实需要在历史地理、建筑艺术、社会经济等专业分析之外,添加对于诗歌等文学文本的解读。后者的多义性、象征性、深刻性,表面上不太好把握,可更容易引起“震惊”的感受。如果超越实际决策,谈论“北京记忆”时,希望深入到历史、人生、精神、文化层面,则本雅明的思路不无可供借鉴处。

如何将被动的“北京记忆”,转化为主动的“记忆北京”,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都必须在回忆之外,添加联想、分析、思考与裁断。这是一个充满激情而又相当艰苦的过程。在《柏林纪事》中,本雅明谈及记忆的意义和方法:

必须不惮于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同一件事情上。将它揉碎就像揉碎土块;将它掀起,就像掀起土壤。因为,那事情本身只是一种储存,一个层次,只服从于最细微的检视,检视土壤中埋藏的真正宝贝……因此,记忆一定不能以叙述的方式进行,更不能以报道的方式进行;而应以最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和狂想曲的方式进行。要将铁锹伸向每一个新

地方；在旧的地方则向纵深层挖掘。^{[12](P221-222)}

记忆政治上的史事人物，也记忆地理上的高山大川，还有就是介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兼及人与物的都市。解读博物馆里收藏的“断肢残片”，需要想象力，也需要科学精神。挖掘者的那把铁锹，既指向深不可测的过去，也指向遥不可及的未来；既指向宏大叙事的民族国家想像，也指向私人叙事的日常生活细节。

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的“导论”部分，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曾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拒绝“预先接受一个抽象的范畴来作为分析的工具”（比如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而是主张“对多元的现象予以经验的观察，再基于这些观察来形构文化类型”。具体论述时，既有历时性的历史溯源，也有共时性的文本分析——后者借助人文学科的内在分析方法，用以“捕捉二十世纪那些不属于科学范畴的文化创造者的内在世界”。全书并不呈现完整的历史图像，而是在各章中分别讨论“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文学与政治、都市规划与建筑风格、贵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大众政治、《梦的解析》中的政治与弑父、绘画以及自由派自我的危机、文化秩序的瓦解以及表现主义的诞生等。每个章节各自独立，分别从不同的领域来探讨同一个主题，“而贯串各章节的基调，乃是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为什么这么处理？那是因为作者意识到，学科的分野越来越清晰，专业化的结果，导致知识支离破碎，研究者在论述中“无法兼顾领域与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在作者看来，“共同的社会体验，乃是孕育文化元素的沃土，也是文化藉以凝聚的基础”。所以历史学家必须学会“评估一个思想内容与跟它同时的其他文化分支的关

系”，穿梭于文学、政治学、艺术史、哲学、建筑等不同领域。^{[13](P36-46)}

关于北京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来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四

大概是害怕被人批评为“怀旧”，20年前，萧乾在杂忆北京时，不断强调自己并非“发怀古之幽思”。^{[14](P11)}在应日本学者要求所撰的《〈杂忆〉的原旨》中，萧先生再三辩解：“我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旧的北京之间，以抚今追昔的心情，来抒写我的一些怀念和感触。”^{[15](P33)}饱含深情地谈论“老北京”，这样一来，很难避免“今不如昔”或“借古讽今”的大帽子。20年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很难体会萧乾当初谈论此话题时的如履薄冰：

从大的方面，我当然更爱今天的北京。……所以当我眼睁睁看着我爬过的城墙和城楼给拆成平地时，我一边往心里掉眼泪儿，一边宽慰着自己说，只要能让人人都吃上饭，拆什么怎么拆都成。^{[15](P33-35)}

不全是外在的压迫，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有此平民意识，不敢以自家的审美趣味来冲撞百姓的日常生活。很久以后，我们方才醒悟到，拆城墙无益于国计民生，纯属“历史的误会”。

前年出版的《城记》，直言50年来北京城市改造的缺失，不但没有受到批判，反而成为畅销书，可见时代潮流的变化。作者王军自称严守记者职责，主要以各种口述及文字资料说话，但入手处是那完整保存北京古城、在古城外建设中心区的“梁陈方案”，对50年来北京城的营建，自然是批评多于赞许。^[16]而绝大部分欣赏此书的读者，也都跟作者一样，对于“梁陈方案”的被搁置“扼腕长叹”。如此明目张胆地“发怀古之幽思”，不怕别人扣帽子，足证20年间思想文化界的进步。

实际上，随着旧城改造的积极推进，“老北京”已走上了不归之路。古都风貌的迅速失落，与北京记忆的日渐清晰，二者之间不无联系。也正是因为痛感逝者不可追，才突然间出现那么多关于老北京的追忆——如果连“追忆”都没有了，那“老北京”可就被彻底埋葬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永远生活在对于过去的记忆之中。一方面，今人的性格、情绪、言谈、举止等，被无数的“旧时风物”所缠绕；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未来的想像，乃是“旧时风物”的续写或反写。历史就像一个幽灵，以片断（而非全景）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不是历史学家和教科书里所谈论的井然有序的知识体系，而是充斥在日常生活中的“文明的碎片”。如此阴魂，召之不来，挥之不去，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现实规划以及未来想像。过去提“新旧杂陈”，往往带有讽刺的意味；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抽刀断水水更流——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怀旧”乃天底下再正常不过的个人情绪与社会行为，既没那么伟大，也没那么不堪。追忆往事，可以是家国兴亡（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也可以是

一己悲欢（如放牧《遣怀》）^[17]可以是儿时趣闻（如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也可以是老来感伤（张岱《陶庵梦忆·自序》）^[18]共同的动机或举措，甚至使用同一文类或题材，都不能保证回忆的质量。

谈论家国兴亡与追忆城市盛衰，二者颇多相通处。实际上，有些重要的“城记”，倘若你“凝神寂听”，同样写尽历史沧桑与人间悲欢。比如，同是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班固的《两都赋》对比东西两京的宫殿苑囿，颂扬后汉的崇尚礼乐、修明法度；鲍照的《芜城赋》则借广陵一城的今昔盛衰，感叹“天道如何，吞恨者多”。表面上，无论是城池宫阙，还是残垣断壁，都无言地屹立在天地间，但对于阅读者来说，除了视觉上的冲击，更有情感上的震撼。这就是历史，也是“追忆”的魅力所在。

同样长期生活在北京，女作家冰心读了《北京城杂忆》后，对萧乾满怀眷恋地描写70年前北京城的色香味不大以为然，因为：

那时的“姑娘”和“学生”，就没有同等的权利！他和我小弟坐过的“叮当车”——有轨电车，我就没有为了尝试而去坐过。我也没有路边摊上吃过东西。我在上学路上闻到最香的烤白薯和糖炒栗子，也是弟弟们买来分给我吃的。^{[19](P31)}

萧乾所记忆的那些“老北京一般的孩子所能享受到的”，对冰心来说都很陌生，这就难怪她对那有着“尘土飞扬的街道”以及“泥泞的小胡同”的老北京，实在很不喜欢。因此，当她说起“灰色的城墙不见了，流汗奔走的人力车夫也改行了”时，由衷地感慨：“我对北京的喜爱是与日俱增的。”^[20]谈及拆城墙，萧乾往心里掉眼泪儿，冰心却没有这种痛楚的感觉。我欣赏萧乾的诚挚，也感谢冰心的直言。读冰心的文章，起码让我们明

白,对于老北京,并非每个人都有好感。换句话说,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北京——因阶级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及文化水准不同,导致了各自“北京想象”的巨大差异。

现实世界中的都市,有着巨大的内在矛盾,所谓“浑然一体”,只是一种假象。就好像以胡同为代表的老北京和以大院为代表的新北京存在着裂缝;紫禁城的皇家政治与宣南的士大夫文化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异。富贵东城与幽雅西山、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并不享有共同的记忆。同一座城市,新旧、贫富、高低、雅俗,同时存在,互相制约。如果再考虑到时间这一轴,还有文体(比如小说、诗歌、散文、专著)本身的规定性,关于北京的诸多记忆,其面貌可能截然不同。正是这“多重变奏”,使得北京作为八百年古都兼国际性大都市,其形象与魅力得到了极好的呈现。

五

原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在谈论现代史上的“双城记”时,提及20世纪早期的北京和上海:“只是大家提起所谓的‘京派’和‘海派’,对前者似乎略带敬意,而对后者颇加揶揄”。在李先生看来,北京的“唯我独尊式的中心主义太强”,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更有文化意义的,其实是上海与香港。^{[21](P40-41)}在一个标榜“边缘”成为时尚的时代,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难逃被批评的命运。可要说世人谈论此话题时,多褒京贬海,这倒未必。

20世纪30年代挑起京海之争的沈从文,确实看不大起商业色彩较浓、或油滑或消闲的海派文人;^[22]可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看。对上海文坛多有批评的鲁迅,面对京海这一话题时,马上读出“北人的鄙视南人,

已经是一种传统”的弦外之音。^{[23](P291-303/P435-436)}比起北人厚重南人机灵之类古已有之的说法,京派近官而海派近商的分辨,无疑更有现代色彩。在《“京派”与“海派”》中,鲁迅称,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文人之在京或没海,不免各有依靠:

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24](P432-433)}

熟悉鲁迅关于“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的论述,^{[25](P382-384/344-345)}当不难明白其对此二者均无好感。可仔细品味,你会发现,并非各打五十大板,鲁迅对京派的反感,似乎还在海派之上。所谓北平的学者文人,其“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其实是语含讥讽的。不是有五四运动的光荣吗?可惜当时的战士,功成名遂后,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难得再有愿意举起匕首与投枪的。

后世的史家,早就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之争;可由于文化立场及学术兴趣不同,对这两座城市依旧各有褒贬。统而言之,谈论近代中国的关注上海,谈论现代中国的关注北京;喜欢都市景观的关注上海,喜欢乡土记忆的关注北京;研究经济的关注上海,研究政治的关注北京;国外学者更关注上海,国内学者更关注北京……现实生活中争强斗胜此起彼伏的“双城记”,俨然已经蔓延到学术领域。

我曾多次提到,国内外学界以上海为视角,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相对来说,作为八百年古都,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更为艰难,从抵抗、挣扎

到追随、突破,其步履蹒跚,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价值。“北京学”研究虽然在目

前远不及“上海学”辉煌,但我相信这个领域更有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 [1] 鲁迅. 忆韦素园君 [A]. 鲁迅全集 [C]. 6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鲁迅. 朝花夕拾,小引 [A]. 鲁迅全集 [C]. 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 鲁迅. 呐喊,自序 [A]. 鲁迅全集 [C]. 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4] 斯蒂芬·欧文,郑学勤译. 追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5] 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 [A]. 鲁迅全集 [C]. 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 鲁迅. 黄花节的杂感 [A]. 鲁迅全集 [C]. 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7] 萧乾.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向城市建设部门进三言 [A]. 北京城杂忆 [C]. 北京:三联书店,1999.
- [8]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9] 陈桥驿.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后记. 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0] 参见拙文:“五方杂处”说北京 [J]. 书城. 2002 (3); 想像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 文学的北京:春夏秋冬. 文学的周边 [M] 1~41页.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 [11] 本雅明著,张旭东等译.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M]. 北京:三联书店,1989.
- [12] 瓦尔特·本雅明著,潘小松译. 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 [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13] 卡尔·休斯克著,黄煜文译. 世纪末的维也纳 [M].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 [14] 萧乾. 北京城杂忆·昨天 [A]. 北京城杂忆 [C]. 北京:三联书店,1999.
- [15] 萧乾. 《杂忆》的原旨 [A]. 北京城杂忆 [C]. 北京:三联书店,1999.
- [16] 王军称:“对这段历史我不敢妄加评说,我所做的只是尽可能寻找并整理史料,它们来自老报纸、老期刊、尚未面世的文字资料、当事人的口述以及与之相关的史籍论著. 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50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城记 [M]. 第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
- [17] 杜甫. 江南逢李龟年.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牧. 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 [18] 沈复. 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 张岱. 陶庵梦忆·自序:“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
- [19] 冰心. 读了《北京城杂忆》 [A]. 北京城杂忆 [C]. 北京:三联书店,1999.
- [20] 参见冰心. 寄小读者. 通讯二十以及“读了《北京城杂忆》”.
- [21] 李欧梵季进对话录 [M].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 [22] 沈从文. 文学者的态度 [N]. (1933年10月1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论“海派” [N] (1934年1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文.

- [23] 鲁迅. 上海文艺之一瞥 [A]. 鲁迅全集 [C]. 4卷; 北人与南人 [A]. 鲁迅全集 [C] 5卷4.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24] 鲁迅. “京派”与“海派” [A]. 鲁迅全集 [C]. 5卷.
- [25]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A]. 鲁迅全集 [C] 7卷. 从帮忙到扯淡 [A]. 鲁迅全集 [C]. 6卷.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Beijing in the Memory and Recollecting Beijing

CHEN Ping-yuan

(Literatur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ll the people who traveled and lived in Beijing would have memory of this city in varying degrees, but not everybody was able to change the impression unconscious and fragmentary into a kind of cultural activity consciously. It means that a person, a historical act or a city may be given a new life if the noun Beijing in the Memory is transferred into the verb Recollecting Beijing. The paper focuses on how changing the passive Beijing in the Memory into the initiative Recollecting Beijing, and suggests that “Beijing Research” have great potentialities even though it is not more splendid than “Shanghai Research” so far.

Keywords: Beijing; literary imagination; cultural memory

(责任编辑: 窦 坤)